



构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体系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导读



高蒙河 (复旦大学文博系)

一. 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经典之作

1985年我考回母校吉林大学读硕士,张忠培先生专门为我们几个研究生开设了《考古学方法论》课程。这个课程的上课方式是以先生讲授为主,但他没有照本宣科,而是开放式地对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师生一视同仁,发表观点,碰撞火花,并由我专门负责做笔录。那时还没有现在这样方便的录音笔,我每次下课后只得趁热打铁,参照师兄弟的笔记,相互回忆,加紧整理,尤恐日久漏遗。及至期末,我誊清后交给先生的记录,是他把考古学方法论的最主要方面几乎都讲授并讨论到了的一个全本,涉及的题目和范畴包括考古年代学、考古学文化分期、考古学文化谱系、聚落考古及其研究历史、考古学中亲属制分析方法的应用等。其中,第一讲就是《如何进行层位学和类型学研究》(以下简称《研究》)。

先生向我们这些学生传道授业,从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两把他称之为考古学的“尺子”入手,是因为层位学和类型学不但是考古学的基础理论,而且其重要性还与考古学的学脉兴衰密切相连。这用他的话说就是:“如果把近代考古学比喻为一部车子的话,地层学和类型学则是这车子的两轮。没有车轮,车子是不能向前行驶的;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向

前发展。近代考古学的水平,首先取决于运用地层学和类型学的程度。”

先生的这段话,源自他1985年给我们讲授《研究》之前,于1982年6月成稿的《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一文(以下简称《问题》)。时隔三年,题目相近,但内涵却不相同。《问题》的内容分别是:层位堆积与划分层位、墓葬、遗迹的层位关系、类型学及其作用、类型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关于陶器的研究;地层学与类型学的关系。《研究》的小节则依次为:什么是考古学?考古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考古学方法论取决于研究对象等。从这些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内容可以看出,先生对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一对关乎考古学兴衰的基础理论问题,显然经历了一个递进思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在我看来,首先与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建设的艰辛历程息息相关。

关注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发展历程的朋友可能都还记得,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一对使近代考古学得以建立的方法论引入中国以后,被李济、梁思永、苏秉琦、夏鼐等中国考古前辈成功应用于中国考古学实践,出现了小屯青铜器研究、后冈三叠层划分、斗鸡台瓦鬲研究、齐家文化墓葬填土分析等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既有针对性地解决了考古遗存的时空框架问题,又摸索出了一些适用性的

技术、方法和理论,不但奠定了地层学和类型学中国化的基础,同时还推进了中国考古学的科学化进程。但需要指出,他们的这些早期研究比较偏重于应用性的实证,尚没有从实践中充分剥离出来,进而形成方法论层面的理论总结和抽象概括,个案性强、普适性弱,还难以起到更加广泛的指导作用。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正当地层学特别是类型学方法深入到教学和研究之际,却遭遇“大跃进”运动,被当成了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繁琐哲学,备受批判,打入冷宫。此后的60年代直至70年代,中国的政治运动频仍,考古学方法论的建设一直起色不大,缺乏进步,更谈不上健康发展。时至80年代初期,随着中国考古事业重新迎来的发展契机和深化学术研究以及考古教学的需要,几乎停滞了二三十年的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开始复苏。苏秉琦在1982年发表的《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中率先指出:“开展对考古学方法论的讨论,无论对考古工作的正常进行,还是对本学科的发展,都具有勿容置疑的意义。”几乎与此同时,俞伟超、张忠培、严文明等人也不约而同地发表了有关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文章,成为了走在新时代前列的先行者。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他们就这样重新开启了研究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大门,翻开了中国考古学思想史上浓墨重彩的一页。由此可知,包括先生《问题》在内的那些早期涉及考古学方法论的文论,假如不是置放在这样的学术进程背景下加以考量,而是仅仅被理解为一篇篇普通的考古学方法论文章,那就难以真正解读出它们所表述的内涵和要旨,并低估了它们居于时代前列的引领价值和示范作用。事实也是如此,那些文章的发表,适时地起到了新启蒙和新开山的作用,使寻求方法的初学者以及苦心悟道的迷茫者有了学习的方向。同时,

也扭转了一些考古人员把层位学简单化、把类型学形式化的倾向,校正了考古学层位学和类型学的向科学健康方向发展的轨道。这正如先生自己在回顾这一过程时所明确讲到的:“我认识到只有明确提出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是层位学和类型学,才能推动中国考古学的发展,这在当时可谓考古学领域的拨乱反正。”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经历长期过程,才迎来的这场考古学的春天,并没有使先行者们徜徉于花开莺飞之间止步不前。作为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行者之一,先生虽以《问题》一文直接掀起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建设的浪花,但显然这还不是本来目的。如果两相比较《问题》和《研究》,我们就不难看出,先生谈的尽管都是关于层位学和类型学的问题,但出发点不同,着眼点有别。先发表的《问题》一文重知识性和操作性,后讲授的《研究》课程更重源流性和指导性。表面上看,一个微观,一个宏观。实际上更重要的是,他对同一个命题是反复思考、不断悟善,进而试图推动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向更高深的方向发展。这正像他对此专门解释过的认识过程那样:“《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发表后,我才认识到要讲清层位学与类型学是考古学的基本理论、方法,必须先说明考古学研究对象以及什么是考古学,而要讲清考古学是什么,就必须搞清楚考古学与有关学科的关系。”他强调自己是“处在颇不自觉的,被讨论的问题的内在逻辑牵着鼻子走的认识阶段。”由此可见,先生是在用自己的认识实践及其过程,“溯源正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力求本末相接,珠联璧合,进而构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

先生着力构建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体系,始终来自于他对中国考古事业发展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一个又一个新的发现展现

在人们面前,有些国内外的学者惊呼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到来了。但是,只有发现,没有研究,没有从研究客体内在联系中提炼出来的规律性的认识,自然也就不能因有这类发现而被赋予黄金时代的美称。”他说:“我感到关于考古学具体课题的探讨及认识,还需要从一个更高的层次,即从考古学方法论上予以讨论。^⑪”于是,我们看到,自从1982年发表《问题》以后至今的约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先生虽然由黑发人变成了白发人,但他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论却孜孜以求,勤躬不倦,时有新见,每有卓识。举个例子,给我们授课所讲的《研究》中的诸小节,先生虽然没有直接地单篇为题专门发表,但实际上他是“边研究,边授课,同时又将认为有些心得且适时的讲义,撕了下来,整理后发表出去”的^⑫。依他开始思考或发表的时序,相继见于先生《研究考古学文化需要探索的几个问题》(1984年)^⑬、《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1988年)^⑭、《关于考古学的几个问题》(1989年)^⑮等。“就那些似乎已经解决,甚至被认为已成为常识的问题,作了新的探讨和阐释。^⑯”

这些文章集腋成裘,1994年先是收入《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一书,由中州古籍出版社发行,成为中国出版的第一部研讨考古学方法论的个人专著。后来,先生又将来自实践并经过实践检验的旧作新得纳入《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成为2004年科学出版社重点推出的《中国文库》第一辑的重要书目之一。该文库主要精选的是20世纪以来中国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名著,我粗略看了一下作者,都是如雷贯耳的大家,如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朱光潜、陈寅恪、范文澜、顾颉刚、鲁迅、沈从文、钱钟书、巴金、王蒙、李泽厚等等。考古学方法论的名著唯有先生一部,其重要学术价值,已不需我再多言。

先生尽管是迄今研究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时间最长、文论最多的大家,但其实他的关于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思考,并没有完全收入上述两个专辑。有些还分别辑录在2004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走向与推进文明的历程》和2005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考古学:九十年代的思考》等文集中,有些则散见在海内外各种报刊上。而像早年给我们授课的内容,至今还有一些是我当年的誊写文本状态,没来得及整理发表。另外,先生这几年关于考古学可持续发展、文物保护、公众考古学乃至最近当选为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前后的一些新识卓见,也都有待结集出版。

总之,先生用大半生呕沥构建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随着中国考古学的实践而拓展,跟着中国考古学的进程而深入,依旧没有停顿之意,反而还有井喷之势。作为在先生引领下走进考古事业殿堂并跬步以随的学生,我们真希望他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意撰写的《考古学方法论》专著,能早日出版,为构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做出新的引领性贡献。

二、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来自 中国考古学实践

中国考古学的实干家多,但既能实干又有极高理论素养的大家却是凤毛麟角,可先生却被张光直称之为中国考古学重量级的理论家之一^⑰。而直接引发张光直作出如此评价的,是先生1993年对中国考古学究竟是走西方道路,还是走自己道路所作的《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一文^⑱。

当时,先生正在依据中国考古学的自身实践,系统地进行考古学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探讨,而美国的“新考古学”开始扣动国门,有些人甚至还把先生倡导的实事求是、透物见人等研究考古遗存进而走近历史真实的主张,归结为已经过时的“传统考古学”。事

物的发展往往贯穿着辩证的逻辑,矛盾的出现又常常能激发出新的思想。在这样的考古学大是大非面前,先生不但对“新考古学”的一些提法进行了解析和批评,同时强调指出“透过遗存层位与类型,方能探知考古学对象运动规律。考古学前进的必由之路,是深化层位学与类型学的研究。”可见,先生面对“新考古学”,是非明确,坚持层位学与类型学作为考古学基础理论的不可颠覆性。与此同时,他又指出具有发展观的层位学与类型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和停滞不前的教本,而是要在考古学的实践中不断充实和完善,才是真正坐拥学术生命力的这一方法论在考古新时期得以继续担当旗舰的关键所在。其中至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考古学的具体应用实践中,建立起既适用于中国又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论。为此,先生躬躬敏行,在构建这样的考古学方法论体系中,“认真总结了我国考古学的实践,从中阐发出一系列新的概念、方法及理论,包括对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都用新概念进行阐述。”¹⁹

细心的朋友可能已经发现,在基本概念上,先生最早期发表的《问题》一文,大标题用的是“地层学”这个当年直接从国外引进考古学时使用的地质学原词。但实际上,他在《问题》小题目或者论证中,已经应用了“层位”甚至“层位学”这个邹衡较早提出的说法。他进一步指出,地层“这一术语,源于地质学,但现在中国考古学使用这一术语表述的现象,及这些现象形成的条件、原因,却相当复杂,已非地质学中的‘地层’一词所能涵盖。”²⁰变“地层学”为“层位学”,表面上看是一字之差的改变,实际上反映出先生在考古学方法论的基本概念上,务实求真的学术追求。众所周知,地层学毕竟是地质学的原始概念,研究的对象是自然遗存,而改成层位学有区别于地质学之意,更能直接表明考古学以人类活动形成的地层与遗迹为主要

研究对象的宗旨。研究对象不同,研究中使用的概念也不能完全因袭,“为什么不叫地层学而叫层位学呢?对此概念有些考虑。一个灰坑打破一个地层,灰坑本身是一个单位,也是一个层位。同一地层下的诸灰坑,往往也存在打破叠压关系,这种关系不便名之为地层关系,称为层位关系似乎好一些。”²¹

他在不同文章中反复阐述的变“地层学”为“层位学”的理念,是在不断提醒大家科学的研究来自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方法来自对研究对象的准确的理解和科学表述。先生“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不仅是说明自己认识的一些变化,同时,也是为向读者声明,如果看到这类矛盾的话,请以较后发表的认识作为我的观点。”²²这与其说表明了先生修正自己认识问题的勇气、责任和学术自信,还不如说展现出先生关注同一个重要考古学问题所素来秉持的持续不断、反复考量,进而使认识不断深化、扩展的学术追求精神,而这种精神又深深贯穿于他们那两代人矢志不移追求的来自中国考古学实践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

众所周知,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以前,考古界对地层的划分还相当简单,流行把一个地层上下的单位都归为同一个地层或同一时期。那时的考古报告在表述遗存的层位学关系时,往往是“某某单位开口于第某层”或者“某某单位属于第某层”,这在现在看来明显是混淆了遗存堆积之间打破或叠压关系的“一锅煮”的说法,在当时却是最普遍的表述方式。先生在苏秉琦的指导下,组织北京大学考古专业华县队在实践中不但力求找出遗存当时的地面,还把地面以下的单位,作为独立的层位来研究²³。这种来自于中国考古实践的客观而精确的认知,后来转换为“某某单位开口于第某层上”或者“某某单位开口于第某层下”的科学表述。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所澄清的遗存所属层位特别是

遗存年代学上的相对早晚关系,准确、客观、明了,更加符合遗存堆积的客观实际,对指导发掘和整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后来还成为各个大学考古专业以及国家和地方考古领队培训的基本教义。

从国外引进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本土化的过程中,既不能在概念上人云亦云,也不能在方法上亦步亦趋。否则,我们的考古学就要走弯路、岔路、冤枉路。这就像先生在《问题》中一开头所指出的那样,上个世纪20年代是以深度计层进行田野发掘的,这种方法违背了堆积的实际情况,不能正确揭示堆积之间的纵横关系,妨碍了对古代遗存进行科学的研究。殷墟特别是梁思永在后冈的发掘,反映了我国田野考古从按深度发掘过渡到按堆积本来面貌发掘的过程。从那以后特别是50年代以来,我国考古人员在半坡、姜寨、元君庙、庙底沟、大汶口、二里头、二里岗等一系列古代遗存的考古学实践中,不断摸索、创新、索证、求真,正确认识了不同于国外的中国古代遗存错综复杂的堆积关系,总结出我国考古学按土质土色划分层位、进行发掘的方法,这就是先生在《问题》中归纳出的考古发掘应当坚持的“四项基本原则”。后经过进一步完善,终于成为了而今众所周知并被广泛应用的中国“考古发掘三原则”:据土质土色划分地层、遗迹等现象;由上及下,由晚及早地进行发掘;按单位归放遗物。这个发掘原则后来被写进了国家文物局勘定的《田野考古工作规程》,在中国考古田野考古发展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指导作用。

当年,北京大学华县队还将诸如窖穴,半地下房屋这样的单位,依其建筑前、建造时、使用时、废弃时、废弃后的堆积划分为不同的层位,在发掘时,依客观实际情况区别开来,以求将其年代定得更为精确,并在这精确年代的前提下,探讨这些单位的年代差别和诸遗存单位的共时性。这些来自实践的

成果后来在《问题》一文中,被先生概括为辨识堆积年代的认识逻辑:建筑前的年代、建筑时年代、使用时年代、废弃时年代、废弃后的年代。这实际上还可以进一步归纳为研究遗存必须关注其制作过程、使用过程、废弃过程等基本原则。只有从方法论上理顺这些过程,才能真正谋求考古学所追寻的全景式复原和社会生活重建,才能逐步走近历史的真实。但可惜的是,及至目前很多人还没认识到揭示这些过程的重要性,至今我们挖掘或认知比较多的还往往是遗存废弃时的年代或状态,而其他状态还没有成为一般人发掘时的自觉意识和主动行为。

由此可见,先生讨论和构建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无论从概念、定义,还是方法、技术上,都进行了不少思考和概括。第一,既不是对国外考古学方法论照单全收,也不是一概排外,而是兼收并蓄;第二,更重要的是,他一直反复强调的“我们应坚持主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中探索透物见人的理论和方法。”^{②4}从中国考古学的丰富实践中,探索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然后再回到实践中去加以检验,作为具体到考古学中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模式,是先生积极参与构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显著特点。而在《问题》这篇先生最早公开发表的考古学方法论一文里,无论关乎层位学,还是涉及到的类型学,我们都能于多处感受到这一点。

比如堪称中国考古类型学研究典范的史前陶鬶的研究,最初的研究者们抓住了这种形态别致、器形复杂的陶器在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中所经历的起源、演变的漫长历史事实,进行了最基本的类型学演变与分析,梳理出了源流关系和传播过程。但先生却从他在中原地区的长期研究实践中的认识中,更加敏锐地发现了陶鬶于形态上的变化结点,指出陶鬶最早的形态是带把壶形

鼎,长期量变积累后产生了质变,发展成为带把壶形鬲式鬶。后者又经过新的量变和质变,发展成为带把壶形鬲式鬶。在此基础上,先生把这种形态多样,数量万千的陶鬶变化过程,高度凝练成为:鼎式鬶→鬲式鬶→鬲式鬶,并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加以总结,认为进行类型学排比的前提,是在功能、质地和形态上相同或相近²⁵。

这类根据我国考古学得失经验和工作体会获得的类型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在《问题》一文中不胜枚举,而今基本上都已成为考古学发掘和研究的指导原则。比如关于类型学的研究,先生总结道:类型学排比要从层位出发,其结论要经得起层位的检验;类型学研究有相对的独立性,通过“桥联法”和“横联法”都可解决没有直接层位关系的遗存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同一文化或同一谱系诸考古文化、和研究不同谱系的诸考古文化,类型学的功能是不同的,等等。再比如有关层位学与类型学的关系,先生也进行了归纳:层位学考察的主要是遗存的相对年代关系,类型学解决的主要是遗存的文化面貌、特征、性质和文化关系;类型学的研究要从层位入手,其结论要经过层位学的检验,等等。除了层位学和类型学,先生还特别提到中国考古学中反映年代、地域变化最敏感的陶器研究的方法:研究陶器要从形态入手,全面考察质地、纹饰、色度、制法等诸要素;注意研究典型器物为代表的基本陶器组合;研究陶器要始终抓一个标准或特征;注意解析器物;正确排定类、型、式;关注数量变化;等等。此不一一赘述了,留待朋友们自己去品读,我想会得到更多的新知新觉吧。

先生曾经指出,“从我国考古研究实践中,总结具有一般规律性质的考古学基本理论及方法论,起始于夏鼐先生《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的发表,而它被人们作为一个课题进行广泛认真地探索,则起自于

苏秉琦先生区、系、类型研究论的提出。²⁶”尽管我们认为夏鼐该文有相当一部分是柴尔德原著定义的转述,但先生作为夏、苏二先生的学生,在追随他们的脚步中,更加关注并积极投身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建设。他的观点和方法,不是零散的,而是系统的,不是因循守旧的,而是与时俱进的,并且都来自对中国考古学研究对象这个客体的反复实践与反复认识。在这样的过程中,先生以中国考古语境或者说以融汇了中国考古概念的语汇,表述了他提炼的考古学方法论,既对考古学成果作了科学的总结,又对广大考古学者产生了影响,在夏鼐“文化定名说”和苏秉琦“区系类型说”之后,把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研究水平,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说句冒昧但发自学生内心的话,我们觉得先生有如一头终年无休、勤奋耕耘的老黄牛,让中国的考古材料牵着鼻子走,像他的老师苏秉琦一样,见微知著、虚实相间、动静相合、实事求是、探索求真,善于把握宏观之间的互动,使层位学和类型学这一对考古学基本理论不断得以充实和发展,成为了中国考古学面貌发生根本变化的指示器和风向标。由此让中国的考古学者不但在考古发现上,更在考古学方法论的建设上,于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获得了今天才有的一定的发言权。

三.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是世界考古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张光直生前于上个世纪90年代前后曾说,世界考古学理论的中心上个世纪50年代以前在欧洲,之后的半个世纪在美国。考古学理论在中国考古活动中一向不大受人重视,没有什么地位,但在最近一些年开始有所进展²⁷。张光直的这个评价,是从世界看中国的一个代表,应当说还是比较客观和中肯的,但也不能说全都符合当年中国考古界的实际情况。

我们认为,中国考古学不太重视理论建设,是指大部分的考古学家或因于治史传统,或苦于内忧外患,或忙于考古发掘,没有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来从事这项研究工作。然而,这不等于说中国考古学界没有人从事理论与方法的思考、探索和求真。先生在回顾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起步阶段的中国考古学时,曾经指出:“当时的中国学者实践中掌握的层位学、类型学及发掘技术诸方面,都高于同时代在中国境内做考古工作的外国学者,同时,在世界考古学中,也处于先进行列。”²⁸后来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及上个世纪50~70年代不断的政治运动,才打断了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建设的运行轨道。到了改革开放以后的80年代起,第一、二代考古学者,不断创新,继往开来,用了将近20年的时间,大幅度地构建起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理论的一系列考古学方法论,丰富了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尤为重要的是,这个体系在可预见的将来,势必将成为世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的组成部分。

实事求是地说,目前谈论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更多能提及的还是我们的考古新发现,而不是输出我们中国的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一句话,世界考古学方法论的话语权还没有掌握在我们手里,这与我们作为一个考古大国特别是想成为一个考古强国不相符的。换言之,中国考古学的黄金时代是否到来,一是要看我们发现和保护了什么或者说能在等量的发掘中提取多少遗存特别是信息;二是在考古实践中如何完善、发展、应用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学科基础的中国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三是中国的考古学方法论体系如何成为世界考古学体系的一部分,并被应用于其他国家的考古学实践。由此可见,我们的道路还很长,我们的任务还很多,我们肩上的担子还很重,但我们毕竟已经上了

跑道开始起跑。

中国考古学的国际化,或者说如何与国际接轨,并做到逐步接轨,双向往来。在先生看来,不是被动地再照单全收地接收国外的理论与方法,而是首先搞好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自身建设。换言之,首先建设好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方法论,也是对世界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体系的重大贡献。这就是他说的:“坚持从中国考古学自身实践寻找考古学的理论、方法,不仅能推进中国考古学健康发展,也可能对世界考古学理论做出应有的贡献。当然,我们不应将自己封闭起来,在主要着力于从自身实践中探寻科学理论的同时,也当善于吸取适用于中国的境外先进的考古学理论、方法。在这个问题上,我主张既反对经验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中国考古学者应本着不卑不亢的态度,勇敢地站立起来。”²⁹

先生在这里提到的我们既要反对传统的教条,同时也要反对新进口的洋教条的主张,很容易被人简单地想象成一种封闭保守或固不开放,而我们却更愿意把这理解为是先生要用中国考古学独立创新的方法论成果,参与世界考古理论之林建设的战略举措。从他上个世纪50年代后期在主持泉护村和元君庙考古工地时,就力图在实践中总结中国考古学方法论开始,到他于80年代初形成比较系统的以《问题》等为代表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体系,先生为我们开辟的是如何在认识真理的过程中,逐步建立以层位学和类型学为基础理论的中国考古学方法论之道,“失道无恒,循道而长”,中国考古学没有这个道,就不会得到长足的发展。相反,中国考古学遵循了这个道,就会不断壮大,就会生生不息,就会产生其小无内、其大无外的深远的影响力。

时至今日,在中国还没有专门研究地层学和类型学这一对考古学基础理论的专著,

因为“迄今对这一问题的探索,虽在学科上已具备坚实基础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并步进了实践——理论——实践的健康轨道,但仍远未构成体系,甚至亦未形成序列的研究,还只是处于起步阶段。”^③所以先生的《问题》一文依旧是专门研究和解读的专篇之一,并一直被北京大学、吉林大学等考古院系作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主要教程文本,其生命力和影响力可见一斑。所以,如果有人要了解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建设,或者有志者若构建中国考古学方法论的体系,并企望这样的体系有朝一日成为世界考古学方法论体系组成部分,我认为不妨从读这篇文章入手。这也是去年《南方文物》约我写有关先生学术思想的文章时,我想向同道特别是年轻朋友们做一个导读性介绍的首选名篇之一。

说到导读,我不能不提的是,其实早在2006年底至2007年初,作为追随先生多年的学生们,许永杰、卜工和我等反复共同商议,想编辑一本《张忠培考古学学术经典导读》,并得到了陈雍、李伊萍等师兄和师姐的赞同。后来永杰手快,给我邮寄来他们草拟的篇目。大体上分为三个篇章结构,一个是考古学文化的谱系研究、一个是考古学文化的社会结构研究,还有一个就是考古学文化的理论与方法。无独有偶,正像张先生给我们上课时开宗明义地要从层位学和类型学开讲那样,《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也被列为该章的起首之篇。后来,大家都忙,拖了两年多。现在借《南方文物》这个学术平台发表出来,一谢师恩,二飨同道,三盼中国考古学方法论早成正果,终成大器,华洋共享。

注释:

①、② 张忠培:《关于考古学研究的几个问题》,《文物研究》总第五辑,1989年。

③、④ 张忠培:《地层学与类型学的若干问题》,《文物》1983年第5期。

苏秉琦、殷玮璋:《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

《文物》1982年第4期。

俞伟超 1981至1982年为北京大学七七至七九级青海、湖北考古实习同学讲授《关于“考古类型学”的问题》,发表于《考古类型学的理论与实践》,文物出版社,1989年;1984年9月为第一期田野考古领队班讲授《关于“考古地层学”问题》,《考古学文化论集1》,文物出版社,1987年;严文明:《考古资料整理中的标型学研究》,《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4期。

⑤、⑥ 张忠培:《向着接近历史的真实走去》,《我的学术思想》,吉林大学出版社,1996年。

⑦、⑧、⑨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序二》,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⑩ 张忠培:《关于中国考古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考》,《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⑪、⑫、⑬ 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编后的检讨》,《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2004年。

⑭、⑮ 张忠培:《〈中国考古学:实践·理论·方法〉序言》,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

⑯ 这篇文章是张先生1984年夏,应湖南省考古学会、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和甘肃省博物馆的邀请,所作的关于研究考古学文化的报告的一部分,后收入文物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张忠培:《中国北方考古文集》中。

⑰ 该文是1988年4月在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成立三十周年纪念暨安徽地区考古学文化讨论会上的发言,1989年刊于《文物研究》总第五辑。

⑱ 该文成稿于1989年8月5日,刊登于《文物》1990年第12期。

⑲ 张光直:《从俞伟超、张忠培二先生论文谈考古学理论》,《中国文物报》1994年5月8日。

⑳ 张忠培:《考古学当前讨论的几个问题》,《中国文物报》1994年10月24日。

㉑ 张忠培:《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与未来》,《瞭望》1987年第36期。

㉒、㉓ 张忠培:《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历程》,《中国考古学——走近历史真实之道》,科学出版社,2004年。

㉔ 张光直:《〈时间与传统〉序言》,三联书店,1991年。

(责任编辑:周广明)